

10.10 171

揚中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
扬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86

封面题签： 仓道洲
封面设计：
主 编： 何幸若

内部发行

1986年11月

扬中县印刷厂承印

《扬中文史资料》第五辑

目 录

一、张绍轩医师·····	(1)
二、缅怀我的父亲·····	(4)
三、徐中和先生与旅沪同乡会·····	(12)
四、郭晓岚先生传略·····	(19)
五、能工巧匠——郭国兴·····	(24)
六、蛇医黄万益·····	(27)
七、赴沪募款救灾忆略·····	(30)
八、云超实验楼记·····	(34)
九、黄墟师范与扬中教育·····	(36)
十、栖霞师训班·····	(40)
十一、“太平义学”兴废·····	(42)
十二、扬中庙会中的民间文艺·····	(45)
十三、斧头街的木偶戏班子·····	(49)
十四、黄山套今昔记·····	(52)
十五、黄步云先生诗钞·····	(54)
十六、旧三涪街种种·····	(55)
十七、头墩子义渡码头·····	(61)
十八、抗日战争前的扬中蚕桑概况·····	(64)
十九、谈谈“久和油坊”·····	(69)

二 十、扬中榨油业的兴起和同业公会的建立	(71)
二十一、补充说明	(73)
二十二、三溱镇冰房	(74)
二十三、张家书店	(79)
二十四、略谈旧社会农村高利贷剥削	(83)
二十五、我县气候特征和历史上的重大灾异	(86)
二十六、一九三一年特大水灾概略	(90)
二十七、太平厅抚民府——扬中县历届县宰更迭表	(98)
二十八、国民党扬中县党部组织演变情况概略	(104)
二十九、天后宫	(108)
三 十、三教庵	(112)
三十一、开沙沧桑	(114)
三十二、育婴堂与育婴洲	(118)
三十三、化子街与十部车	(122)
三十四、劝识字十二月花名小调	(124)
三十五、《扬中文史资料》(第四辑)勘误表	(126)

张 绍 轩 医 师

张绍轩医师，谱名长顺，号永祥，乳名福才。一九一二年三月生，因患肾病，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病故，享年六十岁。家住本邑中段，码头之东，张家墩子（今三湾长乐村二组）。

幼时就学于本村奚文藻先生十余年，通读四书五经。深得老师器重，成年后，志在学医，拜本县酃东乡母子圩老中医奚龙章为师，学医三年。后又经本村邻友郭家友介绍，至常州戚墅堰龙头厂，从西医诊所朱蓉棠先生学西医一年。回扬后，即在兴隆镇南山寿药号，开设中西医诊所，边行医，边学习，探讨疑难。参加天津名中医汤士彦主办的中医函授学校进修。结业后，又参加上海黄河路中医丁济万主办的中医函授班进修；同时，还自修西医，刻苦攻读医学理论。三十岁（1940年）左右，即成了全县著名的中西医师。解放后，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号召，带头组织兴隆联合诊所并考取南京中医学院进修一年，不久，调任扬中县人民医院副院长，兼主治中医科。

张绍轩医师医德高尚，医术高明，临床经验丰富，尤擅长治疗湿瘟、伤寒等时令病和妇女病。对有些疾病，大胆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，效果显著。深得地方人士赞赏，曾赠“泽及群生”匾一块，以表感谢。以是，从张绍轩医师学医者甚多。凡来学医者，必须做一篇论文，以资考核，合格者方取。如吴作仁就写过“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”的论文。先后有季

成美、祝树人、陈家富、奚金章、吴作仁、杜承礼、戴玉堂、王炎、徐明荣、马小芳、施萍、卜位安等。后来有的参加了革命，成了革命领导干部，有的成了中医骨干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张绍轩医师志在抗日救国，经常接近地方领导抗日的同志，如张毅、左继承（光华）、李葆信（为农）、王峰（左纪生）、金道美（金俊）、耿光阴等，因而常能得到党的教育，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，于一九四〇年春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编入长乐、定和两个支部，曾接受张日化同志领导过。他以在家行医为名，把家里作为新四军的秘密交通站，传递信息，转送地下抗日人员。凡在扬中坚持抗日工作的同志有病，无不竭尽全力医治。如王龙、朱尊华、金道美、钱汉珊等同志，都曾在张家治疗过。再如区委书记刘有根（于盛茂）患咳嗽病，长期埋伏在吴家墩子吴福珍家中，经先生精心治疗，获得痊愈，照常工作。县、区干部王拯（杨拯民）、左纪生患时令急性病，经先生治疗，很快见效。当时的区委黄璜患面部疖肿，经先生的手术，痊愈后毫无伤疤。救师杜祥猷被日伪乱戳十几刀，经抢救医好，恢复健康。三涪傅家埭农民傅志仁胸膛被鬼子打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，奄奄一息，经先生抢救，幸免于死。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农历四月初五，刘晓阳同志，在德润乡莫家埭坚持地下活动时，因叛徒告密，遭到敌人武装的包围袭击，敌人的一颗子弹，从刘晓阳背后射进右耳部下。晓阳同志奋勇还击，突出重围，逃到张家。张医师冒着生命危险，立即替晓阳同志精心包扎治疗，并负责转移安全地区。为此，张医师还被国民党区长敲了“一竹杠”。后经地方人士贾老二、祝尧三、张克武等人从中斡旋，交给伪区长食米二十余担和金戒指一只，才算了事。

张医师不仅替革命干部医病，而且替无钱就医的贫苦人家医病。如原三区长乐乡六保蔡兆禄，半夜患急性痧症，其弟蔡兆康黑夜摸到先生家中求医，先生二话没说，随即跟蔡兆康到他家救治。又如今三茅镇英雄村小北圩康（当时靠近三茅敌据点）贫民耿太昌患伤寒症，先生深入虎穴旁边，替耿开方医治，来回几次，一直到把耿的伤寒症治好。病者之女蔡耿氏，现在每当谈起这件事，还念念不忘先生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。象这样的事例很多，难以一一列举。

张绍轩医师本患肾病，左肾早已摘除，残余一只，代偿功能不足，由于长期积劳，调养失当，至“文革”前夕，常出现潜藏生命危险的尿毒症，但仍坚持工作。他常说：“多为人民做点事，可以死而无愧”。十年浩劫，在劫难逃，张医师蒙冤受屈，挨斗被批，身心遭受严重摧残，致使肾病复发，于一九七一年底去世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共扬中县委对张绍轩医师作了公正的结论：张绍轩医师对革命事业和扬中的医疗事业有一定贡献。

本文系根据三溱乡编志组以及蔡承顺、王午桥、徐明荣等同志来稿综合而成，并经夏长昆医师审阅。张绍轩医生之女张剑萍同志亦提供了宝贵材料。

据蔡承顺反映，黄璜、蔡兆康、吴作仁、吴美荣、张长松、张长相等同志，也为此提供了材料。

缅怀我的父亲

我的父亲倪正藩，出生于1910年8月，于1973年11月21日因病逝世，终年63岁。今年，已离开人间十三个年头了。

我的父亲，于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次年6月，任乡农抗会主任，八月任区委宣传科科长。解放前先后在镇江新老洲师范、如皋地委学习过。曾在扬中、武进、泰县货管局、兴化等地工作过。

解放后，他历任武进县税务局课长、卜弋区副区长。武进县商业局副局长，常州市太湖渔业公社党委书记。

十年浩劫中，他同部分老干部一样，遭到了冲击，长时间地挂牌子，晒太阳（挂着牌子在酷暑天站在太阳下），住牛棚、挨批斗，受刑罚，吃尽了苦头。但他始终坚信党，忠诚于党的事业，一直到最后一息。

现在我将他在生活中的几个片断的回忆记述如下：

积极兴办教育

他，刚刚二十出头，就从事教育事业，1932年在泰兴县天星桥任塾师。旧社会，办学条件很差，在几间破草房里，教育着几十名衣衫褴褛的苦孩子。他对孩子读书，要求十分严格，要孩子们下苦功读。书要会背，弄懂；不懂的，他就慢慢地讲解，直到弄明白为止。由于隔江千里远，交通极为

不便，于是就辞去了塾师，于1935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他热爱教育事业，回家后不久，就又“坐馆”了（指作私塾先生）。在家后头的埭上，利用三间两龙爪的草房，又办起了私塾，三四十个学生，还带着两个“附生”（跟着先生吃饭，交几担米的学费），每年七八担米的薪水，由各学生家长供膳。到了1938年，又在十五圩与十六圩埭的中间格子岸上，由农民筹集资金和材料，砌了六间楞摊瓦校舍，这时，由私塾改为学堂，也用上教课书的教材。

他们对学生的教育抓得十分紧，不准学生有一点懒惰的行为，真可谓“从严治学”。有一次，一个三年级学生写了一篇日记，描写了麦子丰收的景象，曾记得有这么几句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又到了个麦收季节，微风拂拂，掀起了翻滚的麦浪，农民们见到这般情景，心里是多么的喜悦，多么的兴奋……”。我父亲在批改这篇日记时，觉得不错，很有一点文彩，怀疑不是这个学生亲自写的，便追问起这个学生，你从那儿抄来的？是谁帮你写的？在弄清这篇日记确实是这个学生亲自写的以后，他很高兴，对这个学生赞扬、鼓励了一番，要他好好学习，继续努力，谦虚谨慎，不断进步。

我的父亲在学校里不仅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，而且还担负着光荣的政治任务和社会工作，当时的社会工作主要有这几个方面：一是做发动妇女的工作，在旧社会，苦水万丈深，妇女们处在最低层，他要裹脚，留发髻，更不能上学识字，老师们以学校为阵地，办起了“强迫妇女识字班”教她们识字明理，同时发动妇女放脚，剪髻，通过这些活动既提高了妇女的思想觉悟，又动员妇女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，做军鞋，慰劳前线战士；二是做组织儿童的工作，动员和组

织儿童站岗放哨，查路条，监视日本鬼子和“二黄”的活动，为地下党组织和新四军通风报信；三是宣传抗日，利用油印小册子、开会、讲课等多种方法，开展爱国抗日的宣传活动，激励和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；四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四县抗敌委员会文教科，经常组织老师到江阴县的登西等地，聆听韦永义、管文蔚等领导同志讲社会发展史、抗日救亡等革命大道理，然后又把这些道理转达给人民群众，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，对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起了舆论先行的作用。

为民锄奸除害

抗日期间，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，地下党和民兵组织活动非常活跃，革命形势发展很好。但在我党开展活动时，时常都会遭到反动分子的告密、阻挠、破坏和干扰，地方上的这些反动势力又往往与日本鬼子和“二黄”、“便衣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对我方开展工作极为不利。

“强龙斗不过地头蛇”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人熟、地熟、关系熟。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破坏性大，危害性深，防卫较为困难。当时主要的危害有三个方面：一是他们千方百计刺探我党我军同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，随时给日伪军和便衣队通风报信，大肆搜捕我方人员，残杀我进步人士，使革命活动遭到打击和损失；二是敲诈勒索，搜刮民脂民膏，有一次本乡土匪陆锦城向一户农民敲榨大米几十担，没有得逞，于是就伺机报复，绑架了我地下党员；三是奸污民女，有的强占人妻，有的强奸少女。他们无恶不作，闹得

人心惶惶，终日不得安宁，人民群众忍气吞声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，使妇女免受凌辱，我们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。这就是发动群众，锄奸除恶。我父亲带领民兵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。对于出身贫苦，误入歧途的，则进行训话教育，要其洗手不干，向党靠拢；对罪行较为严重的，就配合地方武装——常备队，把他们抓起来。区别对待。有一次，有个国民党兵纠集十多人在武进县小河镇北面的黄山活动，被我地方武装和民兵全部抓起来，经严格审问后，对罪恶较轻愿改前非的，准予取保释放，对罪行特别严重的则予以严惩，就地处决，以解民愤。滨江、新民村有两个罪大恶极者，一个在晚上就送进了“青笼子”（即用绳子勒死送下长江）。另一个则被民兵用刀杀死。这一系列的活动，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，保证了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。

“屈打”就是不招

俗话说：“屈打成招”，而我的父亲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，英勇顽强，忍受着疼痛之苦，“屈打”就是不招。

1945年5、6月份，我的父亲因到西来桥镇工作，在途中遇到了日本鬼子的扫荡，不幸被捕，即被带至西来桥陆老三家，进行严刑拷打，“倒灌肚肺”、“做老鸱飞”、“坐老虎凳”，刑罚用尽，而我父亲始终未供出一字。后来我父亲又被押解到武进县小河镇据点，关押在那里。敌人采用了更加毒辣的手段，用竹签戳在十个手指甲里，十个指头，个个出血，十指连心，死过去，喷点凉水，苏醒过来，继续用刑，死去活来不知多少次。而我父亲，始终是坚强不屈，没有使

敌人从我父亲嘴里得到所谓“悔过自新”一个字。我父亲在小河据点里关了二十多天，后来由组织出面，找了两面派乡长陈竞之等人，设法营救，化了六、七十担米的代价，用麻袋装着伪币，贿赂日本桑翻译，才得保出。监狱里的生活把我父亲折磨得身染重病，出狱后，医治了一段时间，才恢复健康，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献身党的事业

我的父亲在参加革命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从大江之南转到大江之北，从地下活动转到公开斗争，从条件比较优越的城市转到条件较差的万顷碧波的湖面上，从经济工作转到渔业生产工作，时时服从党的需要，处处都是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，从不讨价还价。

1951年春，武进县卜弋区，发生了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，突然袭击了区公所，打死打伤了区、乡干部。组织决定将他调去担任副区长，专门搞剿匪工作，他愉快地服从调动，接受了任务。他去后，依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。为了既能除恶务尽，又能保存自己，我父亲伪装敌人的“上司”，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，深入虎穴，诱敌上钩。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深夜，卜弋区中队二十多人，个个作了伪装，穿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以召开会议为名，把敌人全部集中起来，机智勇敢地把敌人一网打尽，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，得到了上级的赞扬。

1960年，我父亲担任常州商业局领导职务，在城里工作，交通、住居、生活各方面都很好，但当时，太湖渔业公社由于遭受渔霸、土匪残余势力的破坏，渔业生产很不景

气，没有什么上市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市委决定调他去担任公社党委书记。从常州到该公社有100多里路，当时的交通又不便，往返只能骑自行车。但他不畏艰苦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。来到了拥有300多万亩湖面的太湖渔业公社。到任后，他发动群众，依靠渔民，把一千多条船上的劳动力都集中起来，学习中央的有关文件，落实经济政策，调动广大渔民的积极性。时间不长，很快就扭转了渔业生产的落后面貌，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吃鱼问题。

1970年，他恢复工作以后，感到自己经过浩劫，失去了多年的时间，要赶紧为党多做些工作。此时他年事已高，可恶的癌病已经潜伏体内，使他日益消瘦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，每天往返跑十多里路，隔几天就下湖和渔民们一起劳动。渔民们看他年纪大，耳朵又不好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都关心地叫他不要再上船了，可他却说管渔业的不上船怎么抓生产？即使在1972年上半年，癌病已经向他发动猖狂进攻时，他每天还是要往返跑几十里，跑不动了，就坐在地上息一会再走，医生叫他赶紧到常州去检查一下，他总是说工作忙，走不开，一拖再拖，最后还是医生陪着他一起去的常州。到常州后，他没有先去医院，而首先向组织汇报了公社的生产情况。他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，直到生命垂危。

心 理 想 着 人 民

渔业生产长期以来靠手工操作，生产工具又十分落后，生产水平很低。众多的渔民，生活贫困。我父亲去后，把渔民的利益放在心上，关心渔民的疾苦。不管是风雪交加的严冬，还是在烈日当空的酷暑，他都坚持深入到船队领导渔

民们，自力更生，搞好生产，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，改变他们贫困落后的面貌。他看到生活特别困难的渔民，就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，拿出一部分来资助他们，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。有一户渔民，劳力较少，人口较多，生活十分困难，我父亲不定期的给他资助，几年下来，共有数百元之多。这户渔民十分感激，在十年浩劫中，“造反派”一再“动员”这户渔民起来“造反”、“揭发”、“批判”，可是这户渔民始终不愿这样做，并说：“倪书记是位关心人民的好书记，万万不能批斗他”。我的父亲在临终前，一再关照我们说：“我的那个本子（指资助渔民的帐单）一定要烧掉，你们谁也不要再去要钱”。遵照他的遗嘱，我们没有谁去讨回分文。

可是他对自己在经济上要求十分严格，从不宕支公家一分钱，自己的生活也十分节俭，穿着十分朴素。对家庭要求也十分严格，1949年6月家乡遭水灾，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，对家内居住条件没有任何改变。解放前，因生活所逼，三间瓦房的瓦卖掉了二分之一，剩下的瓦勉强遮漏，有时遇到大风暴雨连遮漏也不可能。解放了，按理说，应该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了，可是，他从不想到这些，二十多年的时间，没有添一块砖瓦。他逝世后，给子女留下的全部财产仅仅只有一张大床，一顶大橱，一只木箱，没有分文积蓄。

我的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，生前经常教育我们，在政治上要求进步，在经济上要多节约，在生活上要讲朴素。我的弟弟从初中到大学毕业，父亲在经济上、思想上一直是严格要求的，零钱从不乱给，买书时先要讲清买什么书价钱多少后，再给钱。他还经常过问我弟弟的学习情况，读初中时，他总是教育我的弟弟，要积极参加各种活

动，力求上进，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。在我父亲的教育下，我弟弟入团在当时班级里是比较早的。工作后，父亲也总是教育他要节约，不要赚到钱就乱花，要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，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。父亲还利用到常州开会的机会，向我弟弟的单位领导了解他的工作情况，指出他的缺点。我弟弟入党通过的日子，恰好是我父亲与世长辞的那一天。遗憾的是弟弟入党正式通过的消息，父亲未能听到，这是永远难忘的日子。

我父亲他虽然离开我们十几年了，但他的谆谆教导，时至今日，却言犹在耳，激励着我们更好地去为党为人民工作。

倪志民

徐中和先生与旅沪同乡会

扬中县旅沪同乡会，是以团结互助为同乡人谋福利的社会团体。在旧社会，旅居上海的扬中人，以小商贩、做手艺的居多数，开设店号和工厂的占少数，但都安分守己，只求栖身糊口，很少过问外事，因而彼此之间不大联系。早年曾组织扬中旅沪工商会（亦称同乡会），但组织不健全，参加者也不多。上海人看不起扬中人，因而受冷落，被欺侮的事例屡见不鲜，曾迫使少数同乡不得不报镇江籍（或镇江东乡人）。时为上海大孚橡胶厂经理的徐中和先生，对此深感要提高同乡人的地位，确有整顿同乡会的必要。于是，在一九四六年初，相约吴福钧（原同乡会负责人）、凌馥康（云超）、戴爱棠（均生）等发起、並负责改组同乡会的筹备工作。设筹备处于上海九江路一五〇号新康大楼七楼，于此吸收会员。为使同乡会取得合法地位，便于开展工作起见，即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，并领到了扬中县旅沪同乡会的登记执照。不久，假上海北京路、贵州路口的湖社召开成立大会，到会同乡及来宾千余人，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也派员参加了成立大会。当即选出徐中和、吴福钧、凌馥康、戴爱棠、黄庆余、朱广科、葛传广等十五人为理事，王道安、郑渭泉等五人为监事，推徐中和为理事长，王道安为监事长。决定将筹备处正式定为同乡会的会址。（后于一九四八年，迁至上海福煦路福明村四十四号办公）並聘用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办理日常事务（笔者是筹备及工作人员之一），从筹备之

日起到大会成立的经费，以及日常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房租电费一切日常开支，均系徐先生个人负担，从未向同乡会收取任何费用。

扬中旅沪同乡会改组后，徐先生复又积极参加镇（江）、丹（阳）、金（坛）、溧（阳）、扬（中）五县旅沪同乡会的筹备工作，並于一九四六年秋成立，会址设上海老西门京江公所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博士（金坛人）与徐先生有旧，四七年秋，华出国赴美，徐先生曾邀请五县同乡会负责人士许秋帆、赵康华、韩景琦等及各界知名人士假国际饭店，举行欢送宴会。

继上两个同乡会成立之后，一九四八年十月，因事去无锡，得悉旅锡同乡会会务停顿（过去是合组于镇、丹旅锡同乡会内），鉴于同乡福利，立意另行组织，当时因经费困难，他自动承担全部筹备费用。（十月十六日《江声报》转载：“旅锡同乡会即将成立，徐中和先生关怀旅外同乡，独立捐助筹备经费……”）。

扬中旅沪同乡会改组后，广大旅沪同乡，莫不感到有为同乡人办事的机构而欢欣鼓舞。同乡会确实为同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。特别是同乡徐于平被反动警察打伤的事件，同乡会为扬中人伸张了正义。

徐于平是我县八桥人，一九四六年春，因掩护中共扬中县北撤后而留守的干部韩九龄同志，为避敌迫害而逃往上海，生活难度，暂在上海南京路卡尔登大戏院的一个弄口，以摆摊叫卖皮夹、皮带等零星小件为生，不料遭到反动警察无端毒打，身受重伤，经同乡送进仁济医院抢救。徐先生得此消息，首先亲赴医院对受害者进行慰问，並向法院方保证承担治疗费用；同时以同乡会的名义出面告状，並直接向市